

现代新儒家的 文化价值论

余秉颐◎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现代新儒家的 文化价值论

余秉颐◎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价值论/余秉颐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664-1419-9

I. ①现… II. ①余… III. ①新儒家—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24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9431 号

本书出版得到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资助

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价值论

余秉颐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19.25
字 数: 27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ISBN 978-7-5664-1419-9

策划编辑:程中业
责任编辑:程中业
责任印制:陈 如

装帧设计:丁 健
美术编辑:李 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序 言

1997年,余秉颐教授在访问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期间曾致函并打电话给我,询及有关现代新儒学的意义与价值问题,我回应了他的问题,指出现代新儒家思想所代表的正是文化价值与精神意义。若从哲学层面来说,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内涵也可说是一种以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哲学与价值哲学。余教授于第二年回国后,我们有机会在数次国际会议中见面,非常高兴得知余教授在新儒家的研究上继续努力并有所创见。最近余教授告我他写好了一本书稿,希望我为他写序。我立即欣然表示同意,基于我多年的了解,除了要对余教授的研究作出高度评价之外,还想表明我对当代儒学的发展的一些新的理解。

首先我要指出余秉颐教授的这本书,不同于过去二十年讨论现代新儒学的其他书,它具有几个非常突出的特点:(1)余教授突出了现代新儒家的文化哲学,并视为文化价值学。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与重要的哲学课题,重点在立足于人的精神层面建立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反思,肯定中国文化所包含的崇高精神境界与统合天地的人文道德精神。在此一话题下,我们可以展开中西比较价值哲学,以及民族文化的价值基础等问题。(2)余教授十分重视思想概念的清晰性以及命题主张的逻辑论证性,在论述重要的现代新儒家的行文中,理路分明,重点突出,评论公允,处处还原到一个观点的完整面上来。如对张君勱与贺麟的有关民族文化的评论,

都极为精到；对方东美与唐君毅的文化哲学的研究，也都展现了哲学的智见。(3)余教授明确地把方东美先生放入现代新儒家之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视他为现代新儒家的核心人物。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见解。理由是：方东美先生虽有潇洒的道家风范，是一个宇宙生命哲学家，但他仍然十分重视人的发展与人对文化的参与，以及人的生命精神价值的建立。他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舞台上理解与呈现，更加突出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较，后者虽有极为精彩的生命价值，并具有深层次的宗教性，但不妨碍有其精神价值，尤其不妨碍西方宗教有其精神价值。这深刻地突出方先生对此点的洞见是具有前瞻性的。(4)余教授对方东美等人哲学的论述比较突出，而对一般学者重视的牟宗三却较少发挥。我认为是有他的一定的理由的。他的理由应该是牟先生是更为思辨型的哲学家，对文化价值的关注远比唐君毅要淡薄得多。如果文化的重心在形上学与哲学，那么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正凸显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或重要部分。(5)余教授对1958年元旦四先生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的认识》(以下简称《文化宣言》)提出较为详细的表述与分析，对四君子的思想面貌有深入的把握，并把《文化宣言》中对西方文化人士对中国文化的错误态度与错误认识的批评进行了认真的说明。经过余教授的疏解，我相信一般读者也会对当时提出《文化宣言》的四先生产生更深入的同情的理解。这可以说是本书极有价值的一部分，不仅有史料的价值，也具有说明现代新儒家哲学心态与终极关怀的价值。

以下我想对余教授提出的一些看法作出我的理解。诚如余教授所说，现代新儒家思想的重心在文化哲学，而文化哲学的重心则在文化的价值哲学或价值学，这是非常正确的观点。本来人类的发展就是基于生活的实践与对生活方式的自然适应与选择，在适应与选择的过程中，逐渐提炼出来成为自觉的价值，成为生活的目标并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理想。一种文化能达到一种自觉性，成为理想的价值，甚至形成生活与行为的规范，这也就代表了它有一定的人性基础，并具有普及性的本体论的含义。哲学家必须站在这个认识高度来谈文化及其价值。而一种哲学对文

化的理解也就是对文化所包含的价值的理解。由此理解,我们问中国文化的价值何在,它具有何等价值上的含义,以及如何与西方比照与评价,也就是一项不可不面对的有关中国文化今后如何发展的课题。

余教授指出现代新儒家对此一问题特别关切,有其客观的原因。客观的原因是什么呢?回答是,当时新儒学的深刻发展是正当中国文化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因而表现出一种油然而生的迫切感与深厚的忧患意识。所担忧者是中国文化的衰亡,中国文化所彰显的价值的失所,中国文化价值所包含的人的智慧与真理的迷失。明显的是,如果中国文化被丧失,那么中国人就会丧失他的身份认同,丧失他安身立命的根本,就会流离失所,沦为其他文化或强权的附庸。如果西方文化是唯一选择,中国人也将沦落为西方人的附庸。

全盘西化论者预设了西方文化在价值上高于中国文化。但事实上却不尽然,我们有良知与理性,能辨别是非善恶,绝对无法把西方文化看成完美,也不能因其“完美”而取代中国文化。现代新儒家的第一智慧,就在于它认识到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优于西方文化,虽然西方文化在另外一些方面优于中国文化。现代新儒家深刻忧虑中国文化濒临灭亡,他们认识到中国文化濒临灭亡的危机是由于西方军事强权主宰了世界潮流,导致西方文化显示出强烈的吸引力,而非先验地发自中国文化的本身。因之,要救中国就必须救中国人心,使其重新认识与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质与智慧,恢复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但现代新儒家的困境则在于如何克服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呈现的散漫与诸多弱点,又如何说明西方文明何以建立的,如欧美除发展了近代科学,更建立了严谨的法律秩序与民主政治制度,使社会具有较大的稳定度。他们深刻地强调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并认为可以从这种人文精神中开出科学精神。牟宗三先生就是持此一态度。但他们却未能说明西方何以发展了科学而未丧失一定的人文关怀。产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兴起,西方的知识分子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因之,一个持衡的看法应该是:基于生态的环境,中西文化有不同的出发点。西方走天人分离二元主义之路,虽然发展了客观的科学,也成就了主体的创造与自由的规范,但有利利用科技以逐私利之偏失,最后

统一于一个超越的上帝，这也难免有利用上帝来征服世界之嫌。中国文化走天人合一的一元主义之路，虽然发展了慎独、修养自我的道德精神，也呈现了人生和乐融洽境界、天地一片生机的广大和谐的美善景象，却未能改善物质生活，也无法持续保证圣王之治。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往往陷社会于混乱失落之中，虽有法令，却难免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基于此一分析，我们显然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各有特色，但一个民族为了改善物质生活与社会立法，不能不重视科学与法治；为了提升个人精神质量与生命愉悦，则不能不重视个人的德性培育以及社会的情谊发展。若放大到全人类，显然中西文化的精神都是人类所需要的，两者必须各自平衡地发展，也必须相互平衡地发展。这两点应是 21 世纪人类共同的自觉，也应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精义，对此一自觉的推广与全球化的深入认识仍是当前人类的责任。反思现代新儒家对中西哲学与文化的观点，基本上着眼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独特的精神价值，要求自我肯定与高度自觉，同时也强调西方文化在这方面的阙如，这样就形成了中西哲学与文化之间在形上学与形下学方面的对比。中国形上学特别偏向于道德形上学的意识与实践精神。因之中西的对比就呈现出科学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对比，因此，两者的相互激励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为必要。

余秉颐教授对现代新儒家强调道德形上学与道德的实践精神此一特色的叙述与分析，可以说是细致入微、鞭辟入里，他将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视为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并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这无疑是一针见血之论。在他研究的数位新儒家中，唐君毅、牟宗三与贺麟是最强调道德意识的，而且从此角度来肯定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甚至以此作为建立现代化中国文化的基础与起点。牟宗三论说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观点最为典型。但他的“坎陷说”或“进退说”却很难积极开出科学，也未必能解决科学与人文如何融合、平衡发展的问题。也许此一问题也正是所有现代新儒家的问题。但我们却不能不指出，方东美先生并不必然采取同样的看法，他的精神文化现象学侧重于呈现世界重大文化体系的不同丰富内涵，表明了各大文化的各擅己长，各具相对独立的价值，既可以各自体验，也

可以相互欣赏。但为了人类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想的实现,各大文化应相互交往,走向和而不同、不同而合的和睦境界。这是一种截长补短、美善相与的开放态度与博大诉求,自然不同于上述泛道德的文化保守主义。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体会到中西文化相互包含与相互学习的理想原则,以及中国文化在中西相互理解中如何充实茁壮起来的努力方向。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时体会到现代新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概与精神。

在今天对于中西文化我们不仅要进行深刻的理解,而且要积极地去追求相互的理解,从相互的诠释中建立共识与共信,更要进一步参与多元思考与学术的交往,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彰显与重建中国哲学,也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说明西方概念,学习在客观分析中既相互承认又相互评述的方法。如此,方得以拓深理解,进入对方的思绪之中,达到观点的比照与会通,以找到彼此的差异何在、源于何因、导向何处。如此,才能更有效地自我发展,以寻求共同发展之道。我们必须认清有些差异是绝对需要的,不但反映时空的具体性与适域性,也表示人之本体本来就可以容纳不同的自由选择,因之中西文化都应该受到尊重,但又不能不讲求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和谐之道。

1958年,新儒家的《文化宣言》显示了当时新儒家学者对中西文化与哲学的差异高度重视,并因此提出西方学界应向中国文化及哲学学习五种西方所阙如的智慧与精神:(1)“当下精神”(一切放下),(2)“圆而神精神”,(3)“深度同情精神”,(4)“悠久精神”,(5)“世界大同精神”。在《文化宣言》产生这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可以从与西方直接交往已至少一个世纪的经验角度,来评价这五个期盼与要求的当前合理性与可行性,也就是说,西方是否可以学到中国文化及哲学的基本精神,中西哲学与中西文化应如何继续建立理解与契合的重要态度,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 要西方人做到“当下即是”、“一切放下”的实践是非常困难的事。这一要求是基于中国禅学中的“无执的存有”境界而提出的。但“当下即是”却与西方基督教的外在超越精神有所冲突,而“一切放下”则与西方实事实求是的科学精神有所冲突。中国哲学的超越是一种内在超越,心性的

“反身而诚”带来道德的安顿,更重要的是对太极变化与宇宙的认识与体验:所谓“时时是好时”。此是一太极,彼亦一太极。但基督教的“上帝”概念并非“太极”概念。“一切放下”必须不涉及实际利益,但西方为了生存怎能放弃既得利益的考量呢?因此,此要求只有在自身才有超越有用,而难以涉及他者与外界。要西方人理解此意,只能先让他们明白修持的目的与挟持的阶段与过程,在他们自愿投入的情况下,方可为之引导。

2. 张、唐、牟、徐四人在《文化宣言》中要求西方人要有“圆而神”的智慧,要跳出“方以智”的思维方法。这体现了唐君毅所说的“天德流行”的境界。在《易传·系辞》中,“方以智”指的是易卦的明确表露,而“圆而神”指的是著法的易无体、神无方的圆融含蓄。如果“方以智”指的是实证的知识,那么“圆而神”指的是无往而不利的圆融明觉,这也是西方传统中极难实现的事,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圆而神”的智慧就能带来“方以智”的知识(而这正是易卜的作用)。西方现代的知识传统显然无法认同这样的智慧,除非把它看成神性的智慧或知识(divine knowledge)。

3. 要求西方人具有基于爱与敬的同情心,其目的在于希望西方人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希望西方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应是中国哲学与文化中最高的道德精神。对此,我们不能说西方宗教中完全没有此一忠恕精神,但要依循中国儒家的“克己复礼”的方式进行,却是涉及具体实践形式的问题。西方人有其表达生命关怀的方式,不管是理智形式,或情感形式,都有其特殊的形式。在此我们无法要求在形式上的一致。

4. 要求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能够持续悠久的智慧。但中国人又如何使得文化能够悠久持续呢?中国人重视生生不息,凡事留下余地,不为己甚,确是美德。但往往又陷入马虎模糊,不实事求是,却是缺陷。因此中国文化虽然悠久却显出挂漏度日、委曲求全的姿态。西方人力求生活精彩活泼,追求英雄气概,与中国人重视儿女情长的特点形成对比。要求西方人舍此求彼,恐难如愿。因为这涉及文化与生活价值的选择与生活世界的安顿问题,因此只能要求彼此欣赏与彼此尊重,不必求同。

5. 要求西方人学习中国人天下一家之情怀。对此,西方人的回应是

中国应先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才有权利和立场高谈世界一家。而这也正是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后所追求的目标。再说,西方并非没有世界主义与世界公民的思想或理想,如何具体推动与实现此思想或理想,这才是全球有眼光的政治家与哲学家应该关怀的问题。如果只谈情怀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显示新儒家在这点上的务虚而不务实。

总结以上五点分析,人们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化所要求西方人的,不但西方人难以做到,在当代情境中的中国人也难以做到。相反的是,要使这些理想的价值及相关情怀保存下去,我们应该先学习如何讲求实际责任与权利,讲求方正的知识与技能,讲求解决问题、实际帮助他人,讲求具体成果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必须是持续的),讲求自身的健全化与完善化,然后以身作则来具体推动全球人类的和平与繁荣。而这些也都是最根本的儒学精神与智慧。因之,我们对《文化宣言》的评价是:对西方的理解尚需加深,对自身的信心尚需提升。加深与提升之道不仅在于系统地认识对方,更在于建立自己的体系。站在人类文化多元发展的立场,任何文化不能强加己于人,甚至也不能强求对方学习自己,而只能显示自身的美德,使对方自发来学习。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是从自身的修持做起。孔子又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所以,我们应把重点放在自身的完善化上。可以说孔子处处都显示反求诸己、用具体成就以服人之心的态度。

总之,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要求不必陈义过高,西方人能否学习以及能否实践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是一值得思虑的重要问题。要求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的作用,只在彰显中国文化具有与西方文化一样的平等交往的权利,其目的在说明中国文化与哲学有其内在特色,虽然难以学习,但应该受到严肃尊重。此一原则自然也应该用在对西方文化与哲学的学习上面,西方文化有其特色,并非中国或其他文化传统都必须学到做到,但却可以得到中国或其他文化的认知、理解与尊重。至于中西文化及哲学中有属于普遍性的部分,则应是中西方人都应该去学习,而且必须学到,比如在科学技术方面,在经济管理的基本规则方面,在语言思想的分析与推理方面。为了改进物质生活,实现国家的现代性与全

全球化的环境伦理,也为了人类族群、文化与宗教传统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共同发展,我们必须自我学习,也必须相互学习。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也许可以看出新一代儒学或第三代儒家的态度可以具有的改变与创新。至少就我来说,中国文化要求西方的是对中国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尊重,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平等心对待之,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为善之心待之。同时,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要更为谨严,要积极自我修持,力求自我完善,也要积极理解自身,建立自身的哲学体系话语,清晰地表述自身的文化价值,以言行一致来示范于人,而非强加于人。这就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发展的新精神与新方向。

是为序。

成中英

于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大学主校区

2010年8月8日

目 录

序言(成中英)	1
导论 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核心理念	1
一、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精神文化	3
二、精神文化的价值结构:形而下文化与形而上文化	5
三、形而上文化的核心:哲学思想	8
四、结语: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	11
第一章 梁漱溟论东西文化的“路向”与价值	19
一、“意欲”是文化的本原	22
二、“路向”不同的三种文化及其价值	25
三、文化发展的“三期重现说”	37
四、中国人现在应持的态度	41
五、结语	45
第二章 张君勱论科学与玄学的价值分野	49
一、科学与人生观:不同的价值领域	52
二、论欧洲文化	63

三、论中国文化	73
四、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	81
五、结语	92
 第三章 贺麟论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97
一、文化的体与用	100
二、文化批评的原则及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106
三、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111
四、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价值与新道德建设	120
五、结语	135
 第四章 方东美论生命精神与文化价值	139
一、精神文化的不同领域与价值	142
二、“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	163
三、民族生命精神与文化形态	167
四、中国文化的复兴与人类文化的重建	181
五、结语	185
 第五章 唐君毅论道德理性与文化价值	188
一、一切文化活动皆表现道德价值	190
二、中西文化特点之比较	196
三、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价值	206
四、中国现在的文化问题	213
五、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道	217
六、结语	226
 第六章 《文化宣言》论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与现代意义	228
一、西方人士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	233
二、儒家心性之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	237

三、中国文化与科学、民主	241
四、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	248
五、结语	256
 附录一 中国当代哲学的宇宙情怀	
——关于方东美、成中英与新儒学大师的对话	258
 附录二 儒学文明在当代	
——海外新儒家的文化心态	272
 附录三 以生命的精神价值为中心	
——东美论中国哲学的“通性与特点”	278
 参考文献	290
 后 记	294

导 论

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核心理念

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核心理念,是其文化价值观。所谓文化价值观,即关于人类文化的组成及其价值结构的见解。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价值观体现了他们的基本文化立场,反映了他们的文化理想,奠定了他们的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现代新儒家对于人类文化的本原和性质的理解,对中西文化的评价,关于世界未来文化的设想,以及他们在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上所持的根本方针,都可以从其文化价值观中找到根据。

文化哲学与文化学的根本区别,有如哲学与科学^①的根本区别:前者以价值评判为中心,后者以结构和功能研究为中心。文化学主要考察各种文化现象的形成、功能、演变规律、传播途径等问题,文化哲学则从哲学形上学的层次审视、反思人类文化,着重关注和研究文化的价值问题。在文化哲学的视阈中,“文化是价值系统”。^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哲学就是文化的价值学,现代新儒家的文化哲学也不例外。

拙著在对现代新儒家若干代表人物文化哲学思想的考察中,将文化的价值问题作为一个基本的视角。本书各章所考察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文化哲学思想,在著者看来正在这个问题上富于代表性。梁漱溟在

① “文化学”在英语中亦被称为“文化科学”(Science of Culture),归属于“科学”领域。

② 《徐复观先生谈中国文化》,载《徐复观杂文——记所思》,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85页。

堪称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奠基之作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依据其关于人类文化“居中心而为之主的”是“价值判断”的观念,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所具有的不同价值取向进行分析、比较,由此开创了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张君勱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文化思潮的颀颀中,引发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给予中国思想界巨大影响的“科玄论战”,他提出科学与玄学(人生观)属于不同的价值领域,以注重内在道德价值的、富于儒家传统精神的人文主义反对来自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由此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一个基本精神方向——拒斥科学主义。贺麟在其被称为前期现代新儒家思想纲领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第一次提出了现代“新儒家思想”“新儒学运动”概念,明确地肯定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他还对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价值作出了深入的分析。方东美关于人类生命精神与文化价值问题的思想,典型地体现了生命哲学对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影响。而他关于精神文化价值结构问题的系统见解,在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理论中也极具代表性。唐君毅在现代新儒家学者中对道德理性与文化价值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最为全面的阐释。他关于文化是人类道德理性之表现的理念,以及植根于这个理念的关于中西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等问题的见解,典型地反映了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道德理想主义。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四位新儒学重镇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以下简称《文化宣言》),则通过多角度的论述,阐释了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和现代意义。这种阐释不仅是现代新儒家有关思想的集中反映,而且是能够代表后期现代新儒家思想的纲领性的意见。

当然,本书对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文化哲学思想的考察在凸显他们关于文化价值问题的见解的同时,力求内容比较全面,而限于那些直接阐释文化价值问题的内容。因为在著者看来,那些并非直接阐释文化价值问题的著述同样贯穿着现代新儒家关于文化价值问题的思想。他们对人类文化的本原和性质、生命精神与文化形态、不同民族的文化发展道

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文化的复兴与人类文化的重建等问题的论述,都蕴含和体现着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价值观。

一、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精神文化

现代新儒家一般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他们承认这三个层面对于人类生活各有其意义。例如,钱穆在其《文化学大义》中就提出,文化包括“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属于物质经济方面的”,倘若人类没有了物质生活条件,自然无文化可言。第二个阶层“则为政治法律,社会礼俗,群体结合之种种规定与习惯”,倘若没有这些制度,就没有作为“集体”而存在的人类,那同样无人类文化可言。“循此再发展,乃有最高的,亦即最后的,最终极的第三阶层。此一阶层,包括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项,属于纯精神的部门。我们可以说,文化是物质的,集体的,精神的,三部门之融合体”。^① 精神文化的价值,在于让人们求得内心的“安乐”,这是一种比物质享受“更崇高的安乐”。此处所谓“集体的”,亦即“制度的”。可见这里谈论的就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价值问题。

现代新儒家认为,文化的价值集中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因为所谓文化,本来就是人的精神生命的表现。这是他们考察文化价值问题时的基本出发点。

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自序》中说:“盖文化之范围至大,论文化最重要者,在所持以论文化之中心观念。如中心观念不清或错误,则全盘皆输。”这个“中心观念”,就是他所说的“文化即人之精神活动之表现或创造”。^②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联名发表的《文化宣言》,则一再申述:“照我们的意思,文化是各民族精神生命之表现。”“客观上的历史文化,本来自始即是人类之客观精神生命之表现”。他们说人的生命精

^① 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册,第565—566页。

^② 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